

# 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无效性

## ——诺曼·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再发掘

刘旻玮

**[内容摘要]** 作为学科初创阶段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诺曼·安吉尔的国际政治思想长期以来遭到忽视和误读。本文基于对安吉尔成名作《大幻觉》一书的详细梳理，依据其对人类理性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审慎乐观，对国家间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的深刻把握，以及对后世新自由主义诸多议题的开创性贡献，重新明确安吉尔思想在国际政治理论谱系中的定位。此外，本文试图精确还原安吉尔所提出的战争无效论的核心要义：由于各国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战争既不能带来物质上的纯收益，也无法帮助达成国家在非物质层面上的政策目标。与以往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事实上证明而非证伪了安吉尔的战争无效论。对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的再发掘有助于重新找回自由主义范式发展过程中的“失落”环节。

**[关键词]** 理想主义 《大幻觉》 相互依赖 战争无效性

**[作者简介]** 刘旻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回顾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爱德华·卡尔的《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下文简称《20年危机》）可谓是开山之作。此书在理论发展上的巨大成功不仅帮助现实主义赢得了“第一次大辩论”的胜利，更是开启了漫长的现实主义范式霸权时代，迫使理想主义乃至整个自由主义沦为边缘理论。<sup>①</sup>与此同时，理想主

<sup>①</sup> Luciano M. Ashworth, “Where Are the Idealists in Inter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2, 2006, p. 300.

义这一标签的存在使得一大批思想上内涵丰富而异质性极大的学者被不加甄别地划归到同一范式当中,使得国际政治思想史中自由主义的现代发展部分被过分地简化而显得残破不全。<sup>①</sup>直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理论复兴,大量被埋没的“20年危机”时期思想家及其理论才得以被重新发掘。<sup>②</sup>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商业和平论的现代理论源头以及相互依赖概念的发明者之一,安吉尔在其成名作《大幻觉》一书中提出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无效性命题。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巨大反响,前后历经6版,被翻译成25种文字,<sup>③</sup>堪称迄今为止最畅销的国际政治类书籍。<sup>④</sup>也许正是因为该书的巨大成功,爱德华·卡尔将安吉尔立为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年危机》中对其加以重点批判。<sup>⑤</sup>

然而,无论是安吉尔思想的追随者还是批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甚至是误读了安吉尔的理论。限于篇幅,首先,本文选取安吉尔最精华也最具争议的著作《大幻觉》及其核心命题“战争无效性”进行梳理和辨析,试图借此明确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在理论谱系中的定位。其次,对其提出的“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无效性”命题及其主要论断进行还原,力求完整重现该命题的真实意涵。再次,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简称一战)为例,检验安吉尔所提命题的真伪。希望通过上述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对安吉尔——这样一位在理论发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研究的缺失,<sup>⑥</sup>找回自由主义从古典形态向新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失落”环节。

① Peter Wilson, “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 1.

②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 ~ 1938),”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4, 2011, p. 1672.

③ Jacob Heilbrunn, “Case for Norman Angell,”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case-norman-angell-8956>.

④ 此书发行量逾200万本,并于1912被翻译成中文,译名《穷兵大幻辩》,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册。由于该版本年代久远,当代学者以往提及此书时大多使用《大幻觉》一名,本文为行文和阅读之便也用此名。此外,为了准确把握作者本意,本文写作基于此书1910年出版的英文版。

⑤ Jeremy Weiss, “E. H. Carr, Norman Angell and Reassessing the Realist-Utopian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 5, 2013, p. 1159. 参见[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7,37,43页。

⑥ 截至目前,国内以诺曼·安吉尔为主题的研究只有一篇文献。参见储召锋:《诺曼·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解读》,《辽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37~142页。

## 一、安吉尔在范式谱系中的再定位

### (一) 超越乌托邦主义

由于《20年危机》的巨大成功,理想主义者一度成为安吉尔身上最为后世学人所熟知的理论标签。但如果详细考察安吉尔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标签有失精准。

尽管爱德华·卡尔从未能对“乌托邦主义”或“理想主义”进行过明确的概念界定,<sup>①</sup>但通过回归《20年危机》的文本,仍然能勾勒出卡尔眼中乌托邦主义者的大致轮廓。在卡尔看来,政治学领域的所谓乌托邦主义至少包括三大特征:(1)对人类理性盲目乐观;(2)持国际利益和谐论;(3)将政治理论视为指导政治行为的规范,而非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归纳和梳理。<sup>②</sup>参照卡尔自己制定的标准,笔者认为安吉尔绝非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安吉尔对人类理性及国际社会发展持审慎乐观态度。<sup>③</sup>如同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螺旋上升式而非线性演进的。<sup>④</sup>在论证人类历史发展时,安吉尔并未像爱德华·卡尔所批判的理想主义者那样依托于不可证伪的“性善论”或所谓德性。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很快走出同类相残的蒙昧阶段,学会将俘虏充作奴隶而非食物,继而用生产效率更高同时恰好也更为人道的雇佣关系逐渐取代奴隶制,开始发展资本主义,<sup>⑤</sup>绝非是道德因素在起作用,而是

---

① Peter Wilson, "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 4.

② [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6~27页。

③ 自由主义传统上对人性持有相对乐观的信念,但并不过度理想化人的理性,甚至认为人类无法获取足够的智识以达到完全理性。参见 Edwin van de Haar, *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10, p. 20。对安吉尔人性观的分析,参见 Luciano M. Ashworth,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From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to Academ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116 ~ 117.

④ 自由主义认为战争是制度缺陷、均势、国际无政府状态、民族主义、偏见、恶意、无知和误判等“恶”的结果。而这些“恶”是可以被消除的,且一旦消除,战争就不复存在了。参见 Peter Wilson, "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5, 1998, p. 9.

⑤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164.

工具理性使然。安吉尔使用的功利主义论证逻辑更接近后世的经济人假定和理性选择路径。

与此同时,安吉尔强调有限理性对历史发展的阻碍作用。他眼中的人类经常在受到观念和情感等非物质因素的摆布,最终走向战场。<sup>①</sup>为了克服理性的不足,安吉尔主张公众需要被传授与国际政治相关的知识,尤其是“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无效性”,认为只有精英和大众正确了解到这一点,战争的可能性才能大大降低。<sup>②</sup>但与穆勒相信舆论的一贯正确性不同,安吉尔再次表现出对国际政治复杂现实的警惕。依据他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验,安吉尔认为舆论极易受到操纵。群体性效应下的乌合之众、精英集团利益对于国家利益的绑架都将使得舆论遭到扭曲,进而妨碍人们对战争无效性的正确把握。<sup>③</sup>如果说,人类理性的各种局限是阻碍永久和平的初阶困境,那么公正舆论的难得便是阻碍战争消失的二阶困境。对于迈向永久和平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安吉尔是有清醒认知的。

能否认识到国家间利益冲突的客观实在是识别理想主义者的重要尺度。在这一问题上,安吉尔受到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sup>④</sup>承认利益矛盾充斥人类社会,但他认为所谓物竞天择的法则并不能简单套用到人与人之间,这一法则更适用于人与自然的斗争。<sup>⑤</sup>现实主义者眼中资源始终处于稀缺状态,因而行为体之间必须围绕有限的资源存量而彼此竞争,乃至诉诸战争。而安吉尔则认为资源处于潜在的过剩状态,<sup>⑥</sup>只要通过人际乃至国家间合作,人类便能取得与自然斗争的胜利,进而获得资源增量。换言之,如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安吉尔

---

①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137.

② Norman Angell,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Polic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6, 1916, pp. 136 ~ 139.

③ Norman Angell, "Peace and the Public Mind," in Frederick W.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Peace 1926 ~ 1950*,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157.

④ 储召锋:《诺曼·安吉尔国际政治思想解读》,《辽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39页。

⑤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161.

⑥ Jeremy Weiss, "E. H. Carr, Norman Angell and Reassessing the Realist-Utopian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 5, 2013, p. 1167.

认为人类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客观存在,但绝不是无法缓解的死循环。

除此之外,安吉尔虽然敏锐地观察到了彼时勃兴不久的相互依赖现象,并强调在此条件下,成熟工业化国家间冲突的机会成本大增,国家间合作较之以往具有更为显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指出合作的必要性,恰恰证明安吉尔意识到了国家间利益本质上处于非和谐状态。<sup>①</sup>

鲍德温在回顾相互依赖概念的发展史时指出,传统上确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使用相互依赖概念时存在重视“收益”的偏见,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概念的首创者,安吉尔却是个例外。<sup>②</sup> 安吉尔在《大幻觉》一书中指出,所谓相互依赖意味着一国在使他国遭受损失的同时,不造成自身损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sup>③</sup> 通过细究这一基于“冲突—损失”而非“合作—收益”导向的定义,不难发现,安吉尔并非幼稚地认为国家间利益处于和谐状态,他眼中的相互依赖也并不意味着国家间的密切联系一定能够带来共同收益。相反,由于国家间矛盾和冲突的常在性,安吉尔定义下的相互依赖强调单边行动偏离均衡后可能带来的潜在损失。国家间政策协调的初始动力是基于对损失的规避,而非对收益的预期。这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定义方式非但不具有乌托邦主义的盲目乐观,反而更接近现实主义“做最坏打算”的处世哲学。类似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拒绝将相互依赖等同于“互惠互利”,并以军备竞赛为例说明相互依赖只是一种共生状态,并不自带价值判断。<sup>④</sup> 这两位新自由主义代表学者对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的强调与安吉尔可谓不谋而合。

事实上,囿于专业学术训练的缺乏,安吉尔在论述相关命题时高度依赖自身经验及所观察到的政治实践,以至于其观点时常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进行修正。

---

① Norman Angell, “Peace and the Public Mind,” in Frederick W.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Peace 1926 ~ 1950*,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161.

② David Baldwin,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4, No. 4, 1980, pp. 481 ~ 484.

③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260.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h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1975, p. 368.

就此而言，安吉尔非但没有脱离实际，反而与现实的联系太过紧密。<sup>①</sup> 爱德华·卡尔简单粗暴的二分法式划分法和乌托邦主义的标签低估了安吉尔学说的复杂性。如果一定要给这样一位思想家冠以一个标签的话，理性主义而非理想主义可能显得更为贴切。

## (二)从古典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如果说以爱德华·卡尔界定的范式特征为准绳来为安吉尔的学说正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竞争性学说的他山之石，那么为了对安吉尔进行更为精准的二次定位，有必要将安吉尔的理论置于自由主义范式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其与自由主义诸多子范式之间的渊源。

苏长和指出，关于秩序是如何形成的信念——自发的还是在外力介入下形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区分之一。<sup>②</sup> 据此，一战的爆发可以被视为安吉尔学说逐渐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的分水岭。一战之前，安吉尔的学说已经呈现出结构功能主义倾向，不再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强调自然法。<sup>③</sup> 但由于彼时世界经济联系紧密，跨国行为体及其主导下的经济议题一度取代民族国家主导的高政治议题成为那个年代的主题。受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国家以及国际机制的作用并未得到安吉尔的充分重视。一战之后，“金德尔伯格陷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国家行为体的中心性得以恢复，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遭到逆转。在这一背景下，安吉尔虽然仍坚持战争无效论，但更看重集体安全合作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对和平的保障作用，同时愈发强调国家行为体的介入。<sup>④</sup> 其通过公共教育使民众认识到战争无效性，就能减少甚至消除战争现象的信念开始动摇。<sup>⑤</sup> 历经1936年莱茵河地区的重新武装、意大利

<sup>①</sup>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1938),”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4, 2011, p. 1673; Andreas Osiander, “Rereading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R Theory: Id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3, 1998, p. 429.

<sup>②</sup> 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16页。

<sup>③</sup> Cornelia Navari, “The Great Illusion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Norman Ange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4, 1989, p. 342.

<sup>④</sup> Norman Angell, *The Fruits of Victory:A Sequel to “the Great Illusion”*,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1, p. 66.

<sup>⑤</sup> Luciano M. Ashworth, “Where Are the Idealists in Inter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2, 2006, p. 304.

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安吉尔对集体安全机制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sup>①</sup>安吉尔学说中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愈发明显,而非像此前那样将和平视为自均衡的产物。<sup>②</sup>

而对于集体安全机制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安吉尔给出的解答实际上指向霸权供给路径。安吉尔常年游说美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呼吁美国大力支持国联,并将英美等大国的联合视为和平保障。<sup>③</sup>这一见解与《霸权之后》的观点如出一辙:制度创设本质是霸权提供的公共产品。如果说,安吉尔对于集体安全制度的强调使得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制度和平论的色彩,那么他率先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概念,并将之与战争现象相联系的做法则几乎可以被确认为后世商业和平论的滥觞。大量关于相互依赖或商业和平论的严肃讨论在进行文献综述时都承认安吉尔所作出的开创性理论贡献。<sup>④</sup>然而,作为安吉尔思想体系的精华,他的这一部分学说也是遭到最严重曲解的部分。

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以相互依赖为核心假设,初步奠定与现实主义分庭抗礼之势。继而对相互依赖展开的概念史研究可谓是顺应范式深入发展的

---

① Martin Ceadel, *Living the Great Illusion: Sir Norman Angell, 1872 ~ 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03.

② J. D. B. Miller, *Norman Angell and the Future of War; Peace and the Public Mi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p. 88.

③ Norman Angell, "Political Unity First,"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1915 ~ 1955)*, Vol. 29, No. 3, 1943, pp. 409 ~ 411.

④ 不完全举例,参见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33页;邝艳湘:《中美学者的相互依赖理论研究:一种比较的视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期,第161页;白云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变迁:进步及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8年,第68~75页;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和平》,《外交评论》2007年总第94期,第66页;郎平:《贸易是推动和平的力量吗》,《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46页;刘胜湘:《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安全理论及其批评》,《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9期,第23页;梅然:《经济相互依赖与和平》,《国际政治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页;Gerald Schneider, "Peace through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Prospects of Two Liberal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1, No. 2, 2014, p. 173; Katherine Barbieri, Gerald Schneider, "Globalization and Peace: Assessing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6, No. 4, 1999, p. 389; Susan M. McMillan,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7, p. 37;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8 ~ 9; John R. Oneal, Frances H. Oneal, Zeev Maoz, Bruce Russett, "The Liberal Peace; Interdependence,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50 ~ 198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1, 1996, p. 13;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黄其祥等译:《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枝”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必要要求。安吉尔借势重回学者们的视野。可惜的是,擅长解释合作现象的自由主义尚未对战争研究展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进而在主要研究议程中将原本在《大幻觉》一书中紧密相连的“相互依赖”概念和“战争无效性”命题两者割裂开来。以至于相互依赖概念炙手可热,而战争无效性命题却乏人问津。这一情况直到商业和平论研究潮的出现才得到了改善。但现实主义学者仍对安吉尔存在着不小的误读,他们指责安吉尔错误预言战争的消亡。以戈登斯坦为例,他认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的相互依赖来源于安吉尔,而一战的爆发证明安吉尔论述的相互依赖并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因而相互依赖概念本身没有理论和现实价值。<sup>①</sup>事实上,现实主义对安吉尔的批判是失焦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安吉尔是期待而非预言战争的过时。<sup>②</sup>扎卡利亚也明确指出,安吉尔从未认为战争会仅仅因为无法为国家带来效益而被淘汰。<sup>③</sup>

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源在于: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安吉尔的战争无效论等价于商业和平论。虽然同样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和平的重要条件,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战争无效论将相互依赖视为战争消亡的必要条件,要达成永久和平目标必须辅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三者缺一不可。<sup>④</sup>此外,从逻辑来看,战败国立场上的战争无效性,亦即战败后的迅速恢复,甚至可能导致由于行为体对战争成本预期的降低而鼓励战争行为。而深受科学行为主义影响的商业和平论在战争无效论的基础上更加明确研究的核心变量,聚焦于研究单一变量即经济相互依赖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相互依赖视为和平的充分条件。

① Joshua Goldstein, *Long Cycles: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63.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238页。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复兴初期,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两人将安吉尔的“战争无效论”与“战争过时论”相混淆。参见Joseph S. Nye, Jr. and Robert O. Keohan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 Conclus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3, 1971, p. 725.

③ Fareed Zakaria, “Foreword,” in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Fourth Edition, by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Boston: Pearson Longman, 2011, p. xv.

④ J. D. B. Miller, *Norman Angell and the Future of War: Peace and the Public Mi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p. 54.

就因果机制的论证路径而言,安吉尔的战争无效论认为相互依赖在物质和观念两个层面上同时使战争成为非理性选择,而商业和平论出于定量研究对变量可观测性的要求,只考察经济利益的得失对国家战争决策的影响。

至此,本文认为安吉尔立基于时代新特征的学说绝非爱德华·卡尔所谓的幼稚的乌托邦主义。安吉尔开创性地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概念,并将其与战争现象相勾连为后世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变体理论提供了思想根基。为了正本清源,下文将详细剖析战争无效论这一安吉尔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

## 二、相互依赖背景下的战争无效性及其内在机制

在《大幻觉》一书中,诺曼·安吉尔分别从物质和非物质两个维度来论证战争的无效性,指出现代国家能够从战争中获利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迷思。下文根据《大幻觉》的行文结构,提炼出两个命题来详细剖析安吉尔战争无效理论的具体含义和因果机制。

### (一) 命题一:物质层面上的战争无效性

为论证此命题,安吉尔分别从经济危机传导、领土及财富吞并、战争赔偿以及殖民地转移四个角度来切入,力图证明发动战争对战胜国而言其潜在成本可能超过收益,因而是无效的。具体而言,20世纪初,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不仅在货物贸易方面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局面,彼此互为对方的重要外贸市场,同时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基于信誉、信心和预期的金融系统。在此背景之下,战争行为势必冲击国际经济。一方面受害国的市场出现衰退;另一方面加害国的金融受到影响,而这些由战争导致的各国内部负面因素都将通过业已形成的国家间经济联系网络在双方之间产生互动效应,同时向体系内的其他国家传导。<sup>①</sup>

古代战争之所以有利可图,部分是因为财富以贵金属等有形的形式加以保存,能够轻易转移。吞并战败国的领土则意味着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资源包括人

---

<sup>①</sup>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53~56.

口都将归战胜国所有。战胜国对于战利品的消化十分迅速。而现代财富更多地以票据形式在市场上流通，并以国家信用为依托。战争导致信誉受损意味着战胜国相关资产的缩水，加之从战败国转移的资产本身也同时发生贬值，进而使战争行为在总体上还是得不偿失。<sup>①</sup>

与一般人认为战争赔偿能够促进国家发展不同，安吉尔指出无论是现金赔偿还是实物赔偿对战胜国而言可能都是有害的。就理论而言，现金赔偿将导致战胜国可能在短时间内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而以实物形式进行的赔偿则可能造成商品供给的急速扩大，进而冲击国内的相关产业。安吉尔进而以普法战争后德法两国的经济为例论证他的观点，并将战后不久德国爆发的经济危机部分地归因于法国向德国输送的巨额战争赔款。<sup>②</sup>

此外，对于战胜国来说，从战败国手中夺取殖民地的价值也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变得极其有限。彼时，帝国主义的殖民方式发生了变化。英属殖民地高度自治，加之自由贸易政策的广泛实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在与其殖民地进行贸易时并未能获得特惠待遇。每年从殖民地获得的经济收益尚无法弥补其用于殖民地的防务开支。安吉尔同时指出，因为时代的变迁，英国这种松散的、赋予殖民地高度自治的殖民方式已经成为唯一可行的殖民方式，那么如果连英国这样具备丰富殖民经验、已经与殖民地形成强大的文化纽带（治理成本降低）的国家都无法从殖民行为中获益的话，像德国这样的后发殖民国家更无从殖民行动中获益的可能性。<sup>③</sup>

如果说获利是发动战争的首要驱动力，而安吉尔的上述观点又准确无误的话，理性国家似乎已经丧失了发动战争的理由。然而，如果能够通过战争对竞争对手予以沉重打击，进而获得相对优势，这种看似“损人不利己”的战争动机也是合乎理性的。针对此类战争动机，安吉尔指出要对一个国家实行毁灭性打击是

---

①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338, pp. 59 ~ 62. 相似观点，参见[美]斯蒂芬·范·埃佛拉著，何曜译：《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 ~ 136页。

②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90 ~ 95.

③ Ibid. , p. 113 , p. 119.

不可能做到的。安吉尔认为,一国生存主要仰赖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难以被破坏,因而只有大规模地消灭敌国人口才能达到重创敌国的目的。而这种行为在经济相互依赖的大背景下,也就意味着破坏本国商品的重要市场,无异于商业上的自杀行为。而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失败甚至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安吉尔对普法战争后法国的快速恢复给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战败的确重创了法国经济,但也因而使得战后的法国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进而吸引大量外部资金的涌入,使得法国能够从“灰烬中重生”。<sup>①</sup>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还原,不难发现,在安吉尔看来,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无论是想从战争中获益还是想让对方蒙受永久性损失,都是不切实际的大幻觉。从纯粹工具理性角度来看,战争成了应当被抛弃的对外政策工具。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战争无效化所要求达到的相互依赖水平极高,其实质是现实中难以企及、几近完全的生产分工和商品交换,<sup>②</sup>以致战争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很难彻底失效,遑论消失。安吉尔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当时主要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及其发展速度。

而为了回应马汉等人对其忽视战争非理性起源的批判,安吉尔在《大幻觉》的第二篇中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对战争无效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

## (二) 命题二:非物质层面上的战争无效性

在论证战争无法满足国家的非物质层面的政策目标时,安吉尔集中对当时流行的两大观点进行批驳:(1)战争具有淘汰劣等民族国家,促进国际社会演进的功能;(2)战争是复仇和发泄民族仇恨的重要手段。

彼时不少精英相信,战争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领域的表现。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能够将不适应环境的劣等国家淘汰,进而保持人类整个机体的健康。与此相反,安吉尔认为战争非但不能做到优胜劣汰,反而将各国人口当

---

①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31 ~ 32, p. 83, p. 98. 此外,奥根斯基等人关于“凤凰效应”的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观点。参见 A. F. K. Organski, Jacek Kugler, “The Costs of Major Wars: The Phoenix Fact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1, No. 4, 1977, p. 1364。

② Cornelia Navari, “The Great Illusion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Norman Ange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4, 1989, p. 353.

中最优秀的个体送上战场,留下相对弱势的群体,最终导致战后人口质量大大下降。<sup>①</sup>

造成双方观点截然相反的一个重要症结在于,社会达尔文论的支持者从更为整体性的角度论证战争的择优机制。在这方观点看来,战争的胜利意味着战胜国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领域的运行模式存在着某种优势,将被他国模仿,并最终淘汰落后的国家运行方式,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而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安吉尔则更倾向于从个人主义视角来检视战争的筛选功能。双方似乎都认可战争存在某种筛选功能,分歧只在于这种机制到底是正向择优还是反向排优。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一双方立论的前提存在着有待质疑的重大缺陷,而安吉尔未能围绕这一点来反驳,进而论证战争的无效性。事实上,战争是无常的艺术,其结果受到诸多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一次甚至是数次战争的结果并不能用以判断一个民族国家的优劣。也正因为如此,有限次数的有限战争可能并无法稳定地发挥所谓的筛选功能。因而所谓战争能够有效淘汰劣等国家的说法本身的虚妄程度可能远超安吉尔想象。

尽管承认马汉的观点——观念因素比物质因素更值得人们为之一战——有其合理性,但安吉尔认为在相互依赖背景下,无论是为了谋求荣誉还是发泄仇恨,战争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效用。以复仇为例,仇恨得以发泄的前提是区分敌我,借用社会认同理论的话来说便是需要具备“群我”及“他者”。<sup>②</sup>而安吉尔认为所谓的敌人是被建构出来的。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什么与生俱来的、固有的种族敌意。20世纪初,约瑟夫·张伯伦还在鼓吹英德结盟,但是到《大幻觉》付梓之际,两国之间的对抗却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要矛盾。在这10年间,所谓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偏好因为一系列的紧急事件而得到修正。<sup>③</sup>

---

①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217 ~ 218.

② “他者”出现是产生“群我”认同的前提条件之一,此后才能产生敌对情绪和行为。参见 Brent E. Sasley, “Theorizing States' Emo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No. 3, 2011, pp. 458 ~ 459; Ali Aslan Yildiz, Maykel Verkuyten, “Inclusive Victimhood: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Collective Trauma among Turkey's Alevis in Western Europe,” *Peace &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12, No. 3, 2011, pp. 248 ~ 249.

③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294 ~ 300.

在安吉尔看来,由于相互依赖的发展,作为引发冲突、构建敌我身份的重要社会心理前提——民族认同,正在被一种更高层次的身份认同所取代。这种在今人看来已部分为国际实践(例如欧盟)所证实的观点在当时无疑是极度超前的。安吉尔举例论证,由于通信和交通技术的大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势力之间基于共同的利益密切配合,组建国际劳工联盟以反对政府的军事冲动。而资本家之间更是具备天然纽带,甚至不需要国际组织的协调,便能自发地“互助”。<sup>①</sup>当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跨国认同取代以边境为界限的民族认同时,因为无法体认他者加诸“群我”(本民族)的敌意,同时也因为无法认同到“他者”(敌国)的存在,进而使得战争失去复仇的功效。<sup>②</sup>遗憾的是,虽历经百年发展,安吉尔所描绘的跨国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仍然遥不可及,民族主义仍然兴盛,继而使得安吉尔的这部分论述成为整个战争无效性命题论证过程中最为薄弱的内容,影响了命题的准确性。<sup>③</sup>

作为安吉尔思想体系的核心,战争无效性命题在《大幻觉》一书中得以完整展现。安吉尔从物质(四个主要切入点)和观念(两个主要切入点)两个维度,论证相互依赖条件下的战争既无法给战胜国带来正面效益,也无法永久削弱战败国。然而,由于论证所需的知识涉及多个学科,远超安吉尔的能力所及,以至于每一个次级因果机制都未能加以深入分析。<sup>④</sup>进而导致战争无效性命题在一战爆发后遭到曲解和攻击时,安吉尔无力一一加以辩护,而是对相关学说进行了不必要的补充,更为重视公众舆论教育和国际安全机制对于维持和平的作用。虽然相关补充使得安吉尔关于“止战谋和”的思想体系更为完备,但是对于战争无效性命题本身而言,这种修正事实上是多余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战争

---

①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p. 302 ~ 307.

② 通过构建新的共同身份消解原有的敌我身份,详细理论参见 Nurit Shnabel, Samer Halabi, Masi Noor, “Overcoming Competitive Victimhood and Facilitating Forgiveness through Re-categorization into a Common Victim or Perpetrator Ident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9, No. 5, 2013, p. 868.

③ Cornelia Navari, “The Great Illusion Revisited: The International Theory of Norman Angel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5, No. 4, 1989, pp. 355 ~ 357.

④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 ~ 1938),”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4, 2011, pp. 1684 ~ 1685.

无效论”等于“战争过时论”的误读。

###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争无效论”的检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之一,其爆发对安吉尔及其著作《大幻觉》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安吉尔的反对者在将“战争无效论”混淆为“战争过时论”的同时,试图以一战为例证明安吉尔的荒谬。然而,一战事实上并不能构成对于相互依赖情境下战争无效性的证伪。相反,一战恰恰印证了安吉尔在《大幻觉》一书中提出的若干假说和判断。<sup>①</sup>

从协约国角度来看,战胜国在战争中所获得的收益很大一部分为战争投入和损失所抵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协约各国实际所得十分有限。这也就意味着,协约各国认为只有这个数目的巨额赔偿才能使战争行为有利可图。而现实的赔款情况与条约所提出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协约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绝无能力悉数偿还这笔赔款,因而将赔款总额的2/3亦即约40亿英镑搁置起来,将其求偿权委托给赔款委员会,只对剩下的1/3设置还款时间表,要求德国加以支付。<sup>②</sup>通过这一赔偿方案的设计我们不难发现,协约国似乎不再奢求从这一场世界大战中获得净利润。因为依照当时的情况,鉴于战败国有限的赔款能力和意愿,通过获得战争赔款以使战胜国因战争而造成的收支失衡重新达成平衡已变得十分勉强。<sup>③</sup>然而,即使如此,战后初期的德国也不愿采取顺应的策略,配合还款。德国大量超发马克,一方面以此刺激国内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使自己的赔款支付能力枯竭。最终成功地通过这种“自我限制实力”的策略,迫使协约国重新思考德国的赔款总额和赔款方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英国对于战债的态度。尼尔·弗格森认为英国人坚持优先归还战债,进而造成通货紧缩,在德国赔款不到位的情况下,进一步限

<sup>①</sup> Martin Ceadel, *Living the Great Illusion: Sir Norman Angell, 1872~196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36.

<sup>②</sup> [英]爱德华·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3页。

<sup>③</sup>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贾晓屹译:《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04页。

制了英国经济的恢复。<sup>①</sup> 而早已工业化的法国经济基础受到一战的严重破坏,无法再像1815年以农业为基础的法国那样,快速地从大战中恢复过来。<sup>②</sup> 此时的法国因战时财政几近枯竭,急于获得战争赔款。<sup>③</sup> 当德国表现出赖债的苗头时,法国借口《凡尔赛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出兵占领鲁尔地区,以该地区的工业产出抵扣赔款。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德国的消极抵抗很快就让法国认识到占领鲁尔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sup>④</sup>

总之,施加于战败国之上的物质赔偿对于战胜国而言所得有限,同时还为以后的历史发展埋下了灾难的种子。<sup>⑤</sup> 战胜国还没来得及享受战争胜利所带来的荣耀,很快就陷入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动荡之中。而这种政治上的不安恰恰是战后安排在经济领域中遭受失败的结果。作为战胜国,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如果说战前大英帝国的权势虽然受到来自德国及美国的严峻挑战,但其优势地位仍然勉强得以维持的话,战后英国则不得不至少承认美国与其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很多时候需要仰赖美国的合作。从国联的组建到《五国海军公约》的签署,原本属于英国的权势开始加速向美国手中转移。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始衰退而纽约崛起。及至金本位制崩溃,英镑贬值,维系大英帝国的最后一根支柱也随之垮塌。

一战在加速国际权力转移进程的同时,对帝国内政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英国通过获得前德国殖民地、原奥斯曼帝国部分行省的委任统治权而拓展了帝国的控制范围,但正如安吉尔预言的那样,战争使得民众开始觉醒。<sup>⑥</sup> 战前就已经存在分离运动的南爱尔兰进一步从大英帝国中脱离出来。作为帝国最重要

---

① [英]尼尔·弗格森著,董莹译:《战争的悲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336页。

② J. H. Clapham, "Europe after the Great Wars, 1816 and 1920,"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30, No. 120, 1920, p. 425.

③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贾晓屹译:《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④ [英]爱德华·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4~45、47页;[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69~270页。

⑤ Jeremy Weiss, "E. H. Carr, Norman Angell and Reassessing the Realist-Utopian Debate,"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5, No. 5, 2013, p. 1170.

⑥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p. 87.

的海外殖民地,印度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其独立倾向愈演愈烈而难以收拾,<sup>①</sup>又进一步加速帝国的衰落。因此,即使不细究战争在经济上是否能够带来收益,单从权力转移的角度来看,英国投入这场战争之中也难以称得上是明智之举。

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在英国实力下降与欧洲政治破碎化的共同作用之下,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行为体数目大增,欧洲国家之间政治协调出现了严重问题。<sup>②</sup>出于对德国复仇的恐惧,法国一方面分割德国领土以限制其发展,通过地缘安排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割取莱茵河为天然屏障,设置非军事区;使波兰复国并划出波兰走廊,使波兰获得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同时却造成德国的领土尤其是东普鲁士和整个德国的分开。<sup>③</sup>另一方面在谋求英美保障其安全不成的情况下,通过与战后新生国家的联盟拼凑起一个缩小版的神圣同盟。这一系列的措施导致法国的安全较之战前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为恶化。战前法国的安全得到世界一流强国的保证。法俄两国彼此相互给予对方很高的安全承诺。而英国虽然不愿在和平时期为法国承担防卫义务,但当德国威胁法国时,则能不时地表现出不惜为法一战的决心。<sup>④</sup>反观战后法国与东欧小国拼凑出的“小协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但无法构成法国的战略资产,反而成为其战略包袱。在法国支持下复国的波兰使得俄德之间出现了一个战略缓冲带,不仅消除了一个长期阻碍两国关系的症结,还重燃两国合作瓜分波兰的野心。<sup>⑤</sup>之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证明法国一战后在中东欧构建的联盟体系对于其自身安全而言几乎毫无价值可言。

更荒谬的是,法国针对德国的种种措施,使得英国怀疑它企图获取在欧洲的政治经济霸权,而这与英国的长远利益显然是相违背的,短期来看还威胁到了英

---

① Paul 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1984, p. 32.

② Nikolaus Wolf, “Europe’s Great Depression: Coordination Failure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6, No. 3, 2010, p. 341.

③ Ibid., p. 345.

④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310页。

⑤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

国的经济复苏。<sup>①</sup> 英法之间的分歧在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后进一步扩大和公开化。而这一分歧的长期结果则在纳粹德国时期暴露无遗。相较于战前,英法两大战胜国的安全水平事实上不升反降。

从战败国角度来看,战争对于战败的同盟国一方而言显然是无利可图的,没有国家的战前目标是站在战败国立场上而制定的。从逻辑上来说,作为最典型的零和博弈,战争对于战败国的无效性是不言自明的。那战争是否能够满足战胜国打击对手的战略需求呢?以一战为例,作为彼时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一战的失败并没有对协约国的主要对手——德国造成致命的打击。德国经济迅速从战争引发的革命和通胀等问题中恢复过来,1929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sup>②</sup> 超级通货膨胀出现之前,德国经济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有着较好的表现。就业率和出口都表现上佳。而超级通货膨胀出现后不久,德国就通过一系列措施稳定货币,并借此减缓战争赔偿。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固然部分是由于德国经济内生缺陷而造成的,但更主要是由美国输入的,胡佛总统所谓“美国被德国感染”的说辞实际上是倒因为果。<sup>③</sup> 在政治和军事上,《凡尔赛条约》加诸德国的重重枷锁不久之后就被去掉了。德国重新获得大国地位,重整军备。总之,总体战的失败、《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都没有能使德国退出大国行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sup>④</sup>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大帝国看似由于战败而解体,但两大帝国的衰弱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显露多时。战前的奥匈帝国虽然勉强在欧洲五强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已经难以被视为国际体系的决定性玩家。而奥斯曼帝国更是仅仅因为列强之间难以达成一个令各方满意又不造成均势失衡的瓜分方案而得以侥幸维持生存。战后奥地利和土耳其退出大国行列的根源不在于战败。战争不过是催化剂,加速了两国从大国沦为中等国家的降格进程。此外,一战中沙皇政权虽

---

① Frank Spenc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Aftermath of War: I-1918 ~ 1929,” *International Affairs* (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 ), Vol. 43, No. 4, 1967, p. 696.

② John Mueller,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War: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1, No. 1, 1991, p. 7.

③ [德]卡尔·哈达赫著,扬绪译:《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页。

然被推翻,但后继的共产党政权同样致力于俄国的现代化。因此,无论一战爆发与否,其结果如何,俄国都将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sup>①</sup>

综上所述,从权力转移的结构层面来看,或者从一个较长的周期内来考察,战争似乎无法扭转结构变动的既有方向,只能催化原有进程发展的速率。如果将一战视为一场为防止权力转移而发动的预防性战争——无论是英国借战争以打击德国,还是德国用战争手段来遏制俄国——战争对于现状偏好国和挑战国来说都是不符合效用预期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战争绝非没有效果,大战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安吉尔所提出的战争无效性理论事实上更容易在体系层面、长时段视角下通过案例加以检验,但安吉尔本人论证战争无效性时所采用的因果机制和支撑案例大多偏向于短时段的分析和经验事实。此外,除了相互依赖之外,安吉尔未能明确给出理论的前提限定和适用范围,因而导致安吉尔所构建的战争无效论虽然在逻辑上能够自洽,但过于一般化,在遇到反例时难以自圆其说。举例来说,细读《大幻觉》一书,安吉尔实际上通过相互依赖概念的使用限定了战争无效性命题适用的对象,即成熟工业化大国。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不对称相互依赖或者前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低水平相互依赖皆无法使得战争的机会成本高昂到足以打消国家发动战争意图的程度。但安吉尔未能明确指出这一点,其论争对手常常有意无意地用非大国之间战争为例来反驳安吉尔,继而导致该命题长期遭到曲解。

#### 四、结语

正如爱德华·卡尔希望通过支持现实主义来中和当时过度的理想主义思潮一样,安吉尔在20世纪初,欧洲狭隘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用理想主义

---

<sup>①</sup> Paul Kennedy,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1984, p. 31.

来丰富现实主义的贫瘠,用理想主义的思想能动性来调和现实主义的客观决定论”,<sup>①</sup>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自身思想的演变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范式从古典向新自由形态发展的历史缩影,堪称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作之一。<sup>②</sup>他的相关论述还为后世相互依赖、商业和平论等学说提供了思想根基。

时至今日,安吉尔所提出的近代意义上的相互依赖概念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其论证战争无效性命题时所进行的分析以今人的水平来看也颇为浅显,但不宜因此就低估其学说的内在价值,抹煞其在学科发展史中的地位。<sup>③</sup>其思想中的内在缺陷恰恰是后世学者加以着力的理论生长点。时代特征的新变化也使得安吉尔相关命题的正确性存在再次检验的必要。本文依托安吉尔最重要的著作《大幻觉》一书为安吉尔正名,厘清其学说的本来面目。此举只能被视为试图找回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缺失环节(尤其是对于国内相关研究而言)的一次初步尝试。完整重现国际政治思想史发展全貌,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某些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科发展有益的学理养分,需要对包括安吉尔在内的更多 20 年危机时期的思想家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辨析。

---

① [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 年危机: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12 页。

② Martin Ceadel, “The Founding Tex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rman Angell’s Seminal Yet Flawed the Great Illusion (1909 ~ 1938),”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7, No. 4, 2011, p. 1672.

③ 类似观点,参见陈玉聃:《国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两种路径:观念史与考古学》,《国际关系研究》2016 年第 2 期,第 48 页。